

伪利诱威胁下,依然表现了他们善斗的姿态,迂回曲折地干了不少工作”。诸如以拍摄古装片的办法,选择那些中国历史上抵抗外来入侵的题材,以隐晦的、含沙射影的手法,曲折地表示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意识。当然,战时上海电影出品的大多数是商业性娱乐片,考虑到电影的商业特质和产业特性,拍摄这样的影片,主旨多半还是“营利”的考虑,或者可以认为缺少宣传抗战的政治意义,其他方面也未必需要作过度解读。只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当然,不免有小部分人麻木不仁地自立于战线之外,专门摄制些主观上是企图营利而客观上成为麻醉观众,或替敌人粉饰太平的影片”。^①不过,这样的影片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电影人还是坚守了抗战的立场至少是中国人的底线。

但是,无论如何,撤退到大后方的电影人,工作条件更艰苦,生活环境更恶劣,因此,能够主动选择撤退到大后方的那些电影人,牺牲了个人的艺术发展和优裕生活,积极投身于民族的抗战事业,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他们在政治观和道德观上占据着某种天然优势地位,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也是中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上海全部沦陷、“孤岛”不复存在之后,那些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并不得因这样和那样的缘由最终被迫与日本合作的电影人内心世界里存在的某种长久的难堪和尴尬。当战争结束之后,还曾因此引出“审判”附敌“汉奸影人”的风波。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曾经撤退到大后方并坚定地参加抗战的电影人,注意到影响电影人去留抉择的种种复杂原因,不主张过于追究这些留在沦陷区同行的个人责任,如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和史东山所言:“怨怪政府而宽恕他们自己没有勇敢的精神,这是不对的,但是有简直不想参加抗战甚至一向反对抗战的,与曾经要求参加抗战,政府无法容纳,而依然迂回曲折地做了些工作直至被困的,两者自然不应该相提并论。”^②

简而言之,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面临着国家民族存亡的抉择,电影人也面临着他们个人的去留抉择,而这些个人抉择集合一体,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集体抉择的一部分。应该说,中国电影人的抉择,总体上与当时中国抗战的民族抉择是一致的,至于其中个人抉择的差异,或许需要有更多的个案研究,在辨析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战争时期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战争等等纠缠一体而又互有分别的复杂关系,以使抗战史研究有更宏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论题、更贴切的解读、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用好东京审判丰富史料 做出抗战研究好成果

宋志勇

近些年来,国家非常重视对抗战研究的支持力度。在此背景下,档案馆系统、图书馆系统、出版系统与学界通力合作,搜集、整理、公开、出版了一大批珍贵的抗战历史史料。尤其是过去的201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这一

① 史东山:《抗战以来的中国电影》,陆弘石等主编:《史东山影存》上册,第566页。

② 蔡楚生、史东山:《解决上海电影界忠奸问题的尺度》,陆弘石等主编:《史东山影存》上册,第587页。

重大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一大批抗战文献和研究成果集中问世。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一、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多达150卷,令广大抗战研究者喜出望外。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资料。这些年抗战史料的公开和出版规模空前,特别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国家档案馆大量公开抗战档案,此外国家还斥巨资从海外大量征集购入抗战史料,为深化我国的抗日战争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但是,与大量抗战史料的公开、出版相比,我们的研究成果还很不理想。我们学界需要在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之后,克服浮躁情绪,沉心静气,稳坐下来,钻到新史料中,用好新史料,做出好成果。由于近年新公开的史料种类非常多,这里仅就我比较熟悉的有关东京审判系列史料的重要价值,以及如何用好这些资料,谈一下自己的意见。

一、我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赶超,成为东京审判资料收藏和出版大国。东京审判期间,正值我国内战。我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有关人员带回的资料在战乱中遗失,很长时期内,我们能看到的资料,只有倪家襄1948年编写的一本介绍性图书《东京审判内幕》和1953年张效林翻译的一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非全译,有删节)。由于资料的限制,从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时间里,我国几乎没有东京审判的学术研究成果。1983年日本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东京审判国际研讨会时,想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竟没有找到一位中国东京审判的研究专家。近些年来内,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观。最近几年,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2011年启动的“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通力合作,从海外搜集了一大批东京审判的原始资料,并加以整理、编译或影印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国际一流的东京审判资料库。2013年以来,他们陆续编辑影印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50册)、《东京审判历史图片集》、《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6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英文版》(3册)、《横滨审判文献汇编》(105册)、《马尼拉审判文献汇编》(53册)、《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70册)等东京审判的系列史料。上海交通大学的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还编译出版了一批东京审判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以及国外的东京审判研究成果。这样,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我国就在资料收藏和出版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的赶超,一跃成为东京审判史料出版最多最全的国家。我国东京审判史料库的迅速建成,为东京审判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可喜可贺。

二、东京审判的史料内容非常丰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东京审判的史料大都是控辩方精心搜集、整理的证据资料,而这些资料大多是经过了法庭严格审查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这些系列资料的重要性和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东京审判研究本身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近代日本政治史、近代日本对外关系史、亚太国际关系史、日本侵华史、中日关系史、日美关系史、日本侵华人物、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人物、美国对日政策等方面的原始资料,以及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司法实践等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些史料对于我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弥足珍贵。绝大部分抗战研究的领域,都能在东京审判的史料中找到相关资料。深入挖掘、利用好东京审判的丰富史料,对深化我国东京审判的研究和抗日战争的研究意义重大。在东京审判史料的使用上,我国学界将其用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就很成功。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我国学者大量使用了东京审判的史料,甚至辩护方的资料,证明了日本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事实存在,为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争得国际话语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南京大屠杀研究使用东京审判的史料仅仅是一个事例,但就抗日战争研究整体而言还远远不够,东京审判系列史料还有大量可利用的空间。除日本战争暴行外,关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决策过程的史料,日本开展军国主义教育及舆论统制的史料,日本战时对

美、英、苏、德的外交政策,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史料,日本扶植伪满洲国等傀儡政权及进行殖民统治的史料,日本在华种植和销售鸦片等毒品的史料等等,还有大量的史料等待研究者挖掘利用。否则,国家花那么多钱买来的资料躺在图书馆里睡大觉,也是对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开始关注东京审判的史料,并开始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如张宪文研究团队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非常重视对东京审判资料的运用,在他们编辑出版的78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含6卷特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版)中,就有四卷来自东京审判的资料。另外,曹大臣对法庭辩护资料的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曹树基对证人秦德纯证词及作证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张宁静对甲级战犯重光葵法庭审理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韩华对日本鸦片毒害中国的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1卷),以及近年刘广建的《国民政府与东京审判》等一批研究生的硕士、博士论文等,都很好地利用了东京审判的资料。期待今后的东京审判研究和抗战历史研究,更多地挖掘、利用东京审判的系列史料,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三、东京审判系列史料在使用上还要注意谨慎对待,正确使用。东京审判史料的一个特点是倾向性很强,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资料,而是要通过这些资料将被告绳之以法或通过些资料保护被告免受惩罚或减轻处罚的重要历史证据资料。控告方会最大限度地搜集、选用最能说明被告罪行的资料,而相反的资料都会被舍弃。被告及辩护方则相反,搜集、选用的都是能为被告解脱罪行的资料,而不利于被告的资料都被舍弃。也就是说,东京审判控辩方的资料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片面性,仅看一方的资料很容易被误导。另外,在审判过程中,有些证人的证词不真实,也就是做伪证,无论是被告证人(如被告松井石根证人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还是控方的证人(如苏联起诉方证人溥仪关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的一些证词)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东京审判的系列史料虽然丰富,但在使用时要注意鉴别,去伪存真,正确使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史料价值。

[作者宋志勇,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如何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张 生

最近这些年,中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其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陆续出版72卷,是重大标志性基础工程,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史料之上,并揭示了丰富的可能线索。南京大屠杀相关研究著作的精彩纷呈^①,更使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走到了国际学界的前沿。但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与可能,具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① 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孙宅巍:《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宪文等:《南京大屠杀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张生等:《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版)》,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